

資產階級外交方式



蘇聯·塔爾列教授著



發行所



2 026 2080 5

著授教列爾塔·聯蘇
式方交外級階產資

譯 烈祖吳·煦 葆
校 江 曹



行發店書華新

資產階級外交方式

著者 塔爾列

譯者 葆煦·吳祖烈

校者 曹汀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五一九號

0359

1950年2月 1-6000(S1)

前 前

本書係由蘇聯波瓊金教授主編的『外交史』第三卷附錄『現代外交之工作方式方法、組織形式及技術』第一章譯成，其第二章爲『現代外交的組織形式、國際法原理及技術』，業已出版，名爲『現代外交的組織形式』。

校 者 一九四九、八、廿五。

目錄

- 一 以防禦爲名的侵略…………… 四
- 二 以『大公無私』爲名的侵略…………… 一一
- 三 以和平宣傳迷惑敵人…………… 一五
- 四 締結『友好』協定以麻痹敵人的警惕性…………… 二〇
- 五 以反布爾什維主義及反蘇爲宣傳掩飾侵略的詭計…………… 二五
- 六 宣傳『局部解決衝突』以暗中使侵略者便於依次消滅其預定犧牲者…………… 三〇
- 七 侵略者在外交上利用敵人內部的傾軋…………… 三五
- 八 利用敵人國內民族的不和及利益的矛盾…………… 四〇
- 九 挑撥反對勝利的帝國主義者的獨霸以掩飾侵略計劃…………… 四五

一〇 採取有計劃地威脅及恐嚇敵人的辦法.....	七〇
一一 『保護』弱國以爲侵略的藉口.....	八〇
一二 法西斯外交所連貫實行的欺騙和嚇詐政策的特點.....	一〇三

研究有關外交歷史的文件以及觀察並分析各種一定的方式在不間斷的外交鬥爭中的。這種外交鬥爭先於武裝衝突，而在武裝衝突之後又繼續進行，且即在這種軍事衝突進行期間也從不停頓，不過它的進度多少緩慢些。

閱讀外交史時，必須注意特別研究這些事實使我們可以斷定：是依次的，有時是相併的。紀中葉恩格斯就說過：已經政治戰士應當研究軍事藝術的時候，否則他們在為人類美滿前途的鬥爭中有所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之一的恩格斯，他自己不但對於歷史，而且對於軍事技術和「手藝」精通到那種程度以至於專家們在讀到他那沒有署名的軍事論文



時，曾好奇地問：這樣傑出的論文是那位將軍寫的。

對於資產階級外交最特質的方式，蘇聯讀者們應當加以研究，即使是最概括的。至於那些準備在外交領域服務祖國的人們自然應當極其精細地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應當記住，恩格斯的遺訓並不僅對於軍事而言，而且也是關於外交鬥爭的。這就是說，不但在戰場上而且在外交爭辯中與階級敵人相遭遇的時候都必需儘可能清楚地懂得他的方式與詭計。在本章中只是最簡短地對於這樣一些外交方式的基本範疇予以闡述，這些外交方式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外交史中曾經是它特有的『主導動機』，而且在它現在的活動中還被應用着。

爲說明這些外交方式，在這裏所作的實例講解不能包羅很多的實際材料，否則這一章就會變成了一整本書。本書的讀者們自己用不着特別費力就會找到不少足以補充這些說明的事實。

這裏對於最常用的外交方式所提出的類別當然是不完全的。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外交中，和在軍事上一樣，戰略與戰術是非常複雜而且獨特的。如果說我們對於廣泛

的可存在較長時期的外交戰略，不很容易確定其基本路線的話，那末對於不僅日日而且有時在數小時內即行變化的外交戰術的最奇異的曲折與任務，就更難於時時應付了。

下面講的僅是資產階級外交的基本方式，資產階級外交利用它們以達到兩種目的：僞裝自己真正的計劃和假擬實際上所沒有的意圖。

外交藝術上最老的能手之一，十七世紀前半瑞典王國首相阿克塞爾·奧克森舍恩(Axel Oxensjern)曾說過這樣的話：真正的外交家要永遠在手下有兩個馴順的奴隸以供驅使，一個是假擬(Simulation)，另一個是僞裝(dissimulation)。同時他會引用有名的拉丁文的定義加以解說：『假擬虛無而僞裝實有』●。不僅是十七世紀的，甚至於十八、十九、二十世紀的外交家在他們活動中都會熱心地利用過這兩個『奴隸』，因為他們會確認所沒有的東西，而對於實際上存在的則加以掩飾，因此就

● "Simulatur quae non sunt, quae sunt vero dissimulantur".

是實際上既應用了假裝，又應用了偽裝。

在幾個典型的場合，這個究竟如何實際應用於歷史事實中，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一 以防禦爲名的侵略

首先要指出：確認某一戰爭就是爲了『自衛』的需要而引起的，這在外交僞裝上已經成爲最常用的、可以說最陳腐的方式，一直到最近沒有一個侵略者不運用它。

德國最聰明的和最無恥的外交家腓特烈二世曾賦有一種爲德國政治家所獨有的特性。以後相當愚蠢的威廉二世也還是保持着這種特性。可是在希特勒外交活動中它就表現得完全畸形了。這個就是他們努力爲自己對於外交政策的與方法的看法儘量尋求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可是正因爲腓特烈爲人聰明機敏，所以他從來不當衆宣佈自己真實的看法，他只是『爲自己』作些草稿並爲後輩作些親切的『遺訓』，決不想把這些文稿供旁人瀏覽。於是約在一七五二年就出現了他用法文寫的有趣的『政治謔言』

的手稿。（大家都知道腓特烈王對於法文較德文爲精）。直到現在這本手稿並未完全公佈，而其中有些部分還未經印行。在這部『政治謔言』及國王死後問世的其他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腓特烈會把他的一部著作定名爲『反馬其亞威利論』，但是實際上他是佛羅倫薩（意大利中部城名——譯者）思想家所倡導的許多原則的忠實的信徒和追隨者。這些原則到了腓特烈手中就帶有了極其明確而露骨的特點。如你喜歡某一個國家而你既有方法又有機會的時候，那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佔領它，而一經佔領，你就會立即找到些法律家和歷史家，他們將證明你對於這塊土地有無可爭論的權利。腓特烈會把這個思想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運用得左右逢源，而且對於普魯士和後來德國的統治者形成了一種公理。威廉一世曾說過：『真正的霍恩佐倫（普魯士王室——譯者）從不手中放棄已經奪到的任何東西。』自一九三八年法西斯德國開始有計劃地侵佔他國領土以來，這一個命題就以更加粗野的和卑鄙的形式爲戈培爾、吉特里及其他希特勒匪徒們濫用了數十次之多。

德國外交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間侵入比利時一事所作的確證可以算是事前編造

謊言的典型例子，這個謊言的目的似乎要用被迫的自衛以說明破壞本身應盡義務和背叛自己諾言是正當的。

衆所週知，普魯士由於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簽署於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的安全保證條約，因此一如其他簽字國曾莊嚴地負有承認比利時爲『獨立及永久中立國』的義務。不僅如此，而且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一日與英比所締結的特別條約中威廉一世曾經負有義務，遇有任何軍隊侵入比利時或發生其他破壞後者中立情事時，前者應即以其陸軍及海軍協助英國保護比利時的中立。

但這個並未阻止德國政府無絲毫根據以最無賴的和顯然的謊言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傍晚七時向比利時外長達維尼昂宣稱：因爲德國聽到法國人有侵入比利時的『意圖』，所以德國人『有迫切自衛的職責以預防敵入底進攻』，因此須要佔領比利時。其實法國人並沒有任何這樣的意圖，更沒有也不能有任何這樣的傳聞，明明白白不過是根據十五年前史里芬所製成的計劃要達到對法國突襲的迅速勝利，必須通過比利時而已。次日即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德軍遂侵入比利時。

爲了說明德國的外交方式，敘述這一事件進一步的發展是有趣味的。知道侵入比利時在戰略上是完全有利，但尚有一弊是十分可怕的——可能促成舉棋不定的英國對德宣戰，於是德國首相霍爾威格（Bethmann Hollweg）於此事件發生之次日就決定要把因如此無恥破壞比利時中立而在舍歐所產生的這種可怕的形象多少緩和一下。八月四日這位首相曾在帝國議會的講壇鄭重地承認對於比利時是『做了不義的事』，然而無可挽回的，因爲『有需要即無法律』。德國是『不得已』而做了這種不法行爲的，因爲它的『安全』要求它這樣做。但是這個演說發表後才數小時，就發覺這種認罪是於事無補的了。當日晚間英國大使哥申（Edward Goschen）親向霍爾威格提出最後通牒，如德國不立時撤出其侵入比利時的軍隊，英國即對德宣戰。限於六小時以內答覆。德國首相驚惶失措，因爲他在早晨還自鳴得意認爲英國態度軟弱，而現在他受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打擊，簡直是不能自持了。他說了許多難聽的話，這在正常的情況下自然是不會講出的。在哥申講到德國破壞了比利時永久中立的條約而在這個條約上也有德國的簽字時，首相猝然變色地說：『如此說來，居然爲了一塊碎紙你們就

想同與你們有血統關係的國家作戰！』八月四日夜十一時英國對德宣戰。

但是問題並未至此而止。德國外交（仍在霍爾威格當政期內）看到向比利時『衷心而誠懇的』認罪於事毫無所補，於是在破壞比國中立的問題上急速改變態度。突然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認為『軍事需要超乎外交束縛』；因此佔領比國是十分正當的，甚至無須把比利時好似在戰前就準備與英國商定參戰的『證明』提出來。這種證明好似是德佔領軍當局全盤搜查布魯塞爾檔案時在落到他們手中的文件裏找得的。當然在這種『證明』裏一點真實性也不會有的。柏林外交部看到連這種新的『文件證明』都不能引起任何人的信任，便乾脆宣稱不須要任何這類的論證，因為德國如果要作戰的話，那就有權絕對不受任何約束，而為勝利所必需之一切盡力而為。這種新的理論剛剛在外交史上首次這樣顯明露骨地宣佈了，立刻就發生了這種事實，這個還在十八世紀中葉普王腓特烈二世就寫過和講過了。腓特烈的看法在其後代對比利時問題上就光輝地證實了。這時立刻出現了一位拉班得（Laband），他是最著名的法學教授，並在德國稱得起巨星的。這位巨星匆忙地把所謂真正德國科學的光芒照耀到辣手的和

担心的比利時問題上。他在『軍事佔領期內比利時管理』一書中，認定戰時德國軍事當局根本不應爲法律的、亦即以某種法律爲基礎的『有條件的協定』所約束，而須遵循適時的命令和需要。總之，在戰時不應當有一成不變的法律和不能違反的義務；德國軍事佔領當局必須根據唯一的『軍事慣例』而進行一切，同時這些『軍事慣例』是要根據統帥的意志變更和改進的。在拉班得之後又出現許多其他德國的法學家，他們是爭先恐後，相互標榜。例如柏林大學專任教授克列爾 (Kulter) 在集體著作『戰爭真理』中，關於強加於比利時不合法行爲一事曾寫道：『一個國家有絕對的權利保護自己獨有的利益，因此爲了這個就要犧牲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中立國家亦包括在內。』克列爾寫這本書是在麥因 (Marne) 河會戰的前夜，德國人認爲戰爭已完全獲勝的時候，因此他就表現得完全肆無忌憚和恬不知恥了。他宣稱：『法律應當服從於事實並向戰勝者讓步，事實勝於一切 (factum valet)。』(爲了更加『科學地』確證這個字的意義，這位法學家把他最後的推論用拉丁文來說明。)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即侵入比利時三週之後，德國人曾在塔敏鎮鎗決比利時

人四〇〇名，焚燬房屋二六四所並在地窖中活活燒死約二五〇人。以後德國駐在中立國的外交代表對此加以解釋，如果比利時人民再不了解『服從德國戰爭法律』的必要的話，那未來的懲處將更較此爲甚。這種由德國法學家杜撰的『法律』在比利時被堅決地施行了整整四年三個月之久，直至德國人從這個爲他們蹂躪而遍地流血的國家裏被趕走時爲止。

希特勒外交向侵略的外交的領域內加入了它自己的一套。他事前就宣稱過，侵略者不必一定永遠爲自己的侵略找理由而煩惱。有一些場合是可以連這些形式都不要的。進攻蘇聯就是如此。

關於如何最適宜地開始對蘇戰爭，這問題是由法學博士希特勒機關報『國社黨月刊』(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 最活動的人物之一鮑克霍夫(Ernest German Bolkhoff) 來解決的。這位博學的希特勒法學家在其『蘇聯是否爲國際法的主體？』(一九三六年)一書中，對這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不，蘇聯不是一個國家，它只是一羣抱有革命破壞目的的遊牧者。爲了自衛以抵禦布爾什維克的『野蠻人』，任何人

在任何時間都有權直截了當地侵入蘇聯國境並佔有其領土，而不必先警告；提出什麼要求，發出什麼最後通牒，因為『對於蘇聯這種非法的外國武裝干涉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任何的反蘇戰爭，不問發動戰爭者為誰，更不問其開戰理由為何，都是十分合法的』。法西斯法學砥柱就拿這些話來作成他最後的結論。這種說法不過是以假裝的法學形式而出現的一種要求，柏林總參謀部對這種要求早已向德國外交家提出過，就是當一旦決定對蘇作戰時，就應當立即開始而不必在通牒和其他手續上耽誤甚至一小時的時間。祇有突然的、閃電式的進攻才能對付蘇聯。如此看來，外交家和『法學家』對總參謀部所要求的策略早已事先準備好根據了。

二 以『大公無私』為名的侵略

緊接着以『自衛』偽裝侵略的方式之後，最普遍而常用的方式就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掩飾侵略，說什麼為了真理、自由、博愛等而完全『大公無私』地擁護某種崇